

明末耶穌會士高一志
在南京的傳教活動

段春生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long discussions among scholars concerning the Nanjing persecution. There has, however, been less study regarding the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Nanjing by the Italian Jesuit Alfonso Vagnone. As a Catholic missionary, the aim of his mission was to proclaim the gospel to the Chinese people. He used scientific methods in order to lead the Chinese to conversion.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his life in China is the key to studies on his missionary activities. This key not only helps us to interpret the Nanjing Incident; it also helps us in understanding Alfonso Vagnone's thought. This essay aims to study Alfonso Vagnone's missionary work by looking through the historic information on the Nanjing Incident. Firstly, there is a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Secondly, this essay discusses how, like Matteo Ricci, he used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scholarly mission" to demonstrate Catholic doctrine to the upper class. Thirdly, the essay discusses how Vagnone founded a Sodality of Our Lady and trained lay people to preach to the ordinary people. Finally, the essay concludes with the testimony of their faith in God during the Nanjing persecution.

一、高一志其人

明末意大利耶穌會士高一志，1566年1月，出生於意大利北部都靈城十公里外的特羅法雷洛（Trofarello）一個貴族家庭。他自幼在都靈接受了良好的人文主義培育。1584年10月24日，高一志進入米蘭布雷拉（Brera）耶穌會院開始初學，在該學院接受了長達十三年的系統的培育，主要研讀神學、哲學、聖經、靈修、修辭學，等人文主義學科。1599年1月晉升為神父，在布雷拉學院教授五年文學、修辭學、哲學。1604年，被派遣往印度和中國傳教。1604年4月底至澳門，不久，出發去肇慶和韶州，1605年2月底，最終抵達南京。¹

1 A. Chiotti and L. Pfister, *Nella scia di un Grande: Sei illustri missionari Gesuiti Italiani nella Cina del XVI e XVII secolo* (Taiwan: Chungtai press, 1991), pp. 26-35; Duan Chunsheng, *L'attività missionaria e pedagogica di Alfonso Vagnone S.J. in Cina (1605-1640)* (Milan: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di Milano, 2014), pp. 63-73; 費賴之著、馱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83；段春生，〈晚明意大利耶穌會士高一志生平考〉，《輔仁大學歷史學報》，2017年待發表。

1616年8月31日，南京教案爆發，王豐肅被捕入獄，1618年初被遣送至澳門，結束了他在華傳教的第一時期。²1617至1624年，他在澳門聖保羅公學院教授五年神學與哲學。1624年3月，他獲悉南京教難發起者沈淮歸天，遂改名為高一志，字則聖，³潛至南京附近的建昌及丹徒縣一帶傳教，因其在南京影響頗大，徐光啟建議在華耶穌會負責人李瑪諾（Emmanuel Diaz Senior, 1559-1639）派高一志到偏遠的山西絳州，因為那裡正好急需一位傳教士。

高一志在其人生的最後十五年裡，於山西絳州一帶傳教成績斐然。他在段袞與韓霖兩大家族鼎力支持下，付洗八千餘人，建教堂與祈禱所102所，被譽為山西開教宗徒。⁴在學術方面，他也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他勤勉寫作，著述宏富，所譯著之中文書籍達二十餘部，舉凡在倫理、教育、神學、哲學、修辭學等領域均有卓越的建樹。他的《童幼教育》、《達道紀言》、《齊家西學》、《修身西學》、《十慰》，尤其《聖母行實》流傳甚廣，直至上個三四十年代依然在教會刊印流行。⁵1640年4月9日，高一志在他離開意大利三十七年之後，安逝於山西絳州——他傳教的大本營。⁶

2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113-128。

3 王豐肅從此改名為高一志，自此本文行文皆採用高一志。

4 鄧恩著，余三樂、石蓉譯，《從利瑪竇到湯若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289-290；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92；高龍鑿，《江南傳教史》，冊一（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頁263。

5 1746年，雍正禁教期間，有一份福建福安的天主教被捕名單。該書曾被認為判別是否為教友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凡是在家中搜到藏有高一志的《聖母行實》者，即被認為是天主教教友，即刻被捕。見吳昊與韓琦編，《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期天主教文獻彙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88、95、99、104、130；Duan Chunsheng, *L'attività missionaria e pedagogica di Alfonso Vagnone S.J. in Cina (1605-1640)*, pp. 172-175.

6 A. Chiotti and L. Pfister, *Nella scia di un Grande*, p. 35；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頁83。

二、高一志在南京

南京作為中國「六朝古都」，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史上均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定都於此，1421年，明成祖朱棣（1360-1424）於遷都北京後，南京即成為明朝陪都，與北京遙相呼應。

1595年6月1日，利瑪竇首次到達南京，曾為六朝古都的繁華與美麗而驚嘆，他在《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一書中，把南京形容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他以優美的文筆描述：

南京城是世界上最大、最美麗的城市。這樣說其實並不過份，因為城中到處都是高大建築，其中有公共設施，也有私人房舍，還有眾多的寺廟、塔和不計其數的橋梁。這裡還以土地肥沃、空氣清新、人才濟濟、民風淳樸、語言優雅而著稱於世。此外，城中居民也多樣多樣，有貴族、有知識份子、有官員，在級別上，這裡的官員與北京一致。不僅是中國，而且在所有東方國家中，這都是首屈一指的城市。⁷

1597年7月20日，在瞿太素等朋友幫助下，利瑪竇成功的進入南京並迅速展開其傳教活動。1599年5月24日，承蒙友人劉冠男幫助，利瑪竇在正陽門內洪武崗西崇禮街（今尚書巷）購買了房屋，建了中國天主教第四座教堂。⁸

7 利瑪竇著，文輝譯，梅獻金校，《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194。

8 利瑪竇在南京城四羅寺的住址，後來成為今天的主教座堂——石鼓路天主堂。參閱利瑪竇，同上書，頁254-263；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頁119。

1600年3月，利瑪竇踏上了在中國最終的旅程——向北京出發，準備給萬曆帝進呈禮物，希望打開向中國傳福音的門。當時南京教務由羅如望（Jean de Rocha, 1566-1623）與郭居靜（Lazare Cattaneo, 1560-1640）二位神父負責。

1605年2月，高一志抵達南京時，羅如望時任南京會院的負責人。⁹1605年3月16日，高一志致信羅馬耶穌總會長，匯報了他與林斐理、黎寧石一行人到達南京，¹⁰開始一起學習中文的情形，並表達了無法很快掌握語言的困惑，「在這棟房子裡，只有一位神父和一位本土修士懂漢語，還有三位正在學習漢語的神父，這意味著我們都已經受過漢語訓練了，我們能做的遠遠不止這些。……我們跟羅如望神父學習中文和文學」為的是「早日在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開始傳播福音」。¹¹到1608年，他和同伴成功皈依了這位來住院教課的華人老師，這無疑令高一志感到一絲慰藉。¹²

9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691；P.T. Venturi,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 vol. II (Macerata: F. Giorgetti, 1911), p. 451 (以下簡稱*Opere storiche*)；P. D'Elia,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vol. II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pp. 277-278. (以下簡稱*Fonti Ricciane*)。

10 與高一志一同到澳門的有日後成為日本殉道聖人的科斯坦佐（Beato Camillo Costanzo, 1571-1622）、錫蘭殉道聖人邁特拉（Jean Matella），以及陽瑪諾（Emanuel Dias Júnior, 1574-1659）與林斐理（Feliciano da Silva, 1578-1614）。由於陽瑪諾患病，當時只有高一志與林斐理一起到了南京。參D. Bartoli, *Del 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La Cina*, IV (Firenze: Leonardo Ciardetti, 1829), p. 27; A. Chiotti and L. Pfister, *I grandi missionar Alfonso i Vagnone*, p. 45; P. D'Elia, *Fonti Ricciane*, vol. II, pp. 277-278.

11 柏里安（Liam Mathew Brochey）著，陳玉芳譯，《東游記：耶穌會在華傳教史1579-1724》（*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澳門：澳門大學，2014），頁184。（以下簡稱《東游記》）。

12 同上書。

1604年至1609年間，在利瑪竇領導下中國耶穌會傳教區風平浪靜，一切進展順利。當是時，高一志深居簡出，努力學習中國語言和儒家典籍。¹³對此，《破邪集》寫道：「豐肅數年以前，深居，簡出入，寡交遊，未足啟人之疑，民與之相忘，即士大夫亦與之相忘」。¹⁴1606年2月15日，利瑪竇致信總會長阿奎委瓦 (Claudio Acquaviva, 1543-1615)，對高一志有高度的評價：「王豐肅神父 (高一志) 在南京已兩年了，努力學習中文與文學，很有成績，做事睿智有德，那裡的長上對他非常滿意。他入會已多年，學業與受試皆表現良好，相信他可以矢發本會四大聖願」。¹⁵1606年8月13日，高一志被利瑪竇安排在南京「由李瑪諾神父宣發了耶穌會第四聖願，第二天又發了耶穌會小兄弟的願」。¹⁶

至1609年，高一志到南京已四年。他勤勉刻苦學習中文及儒家經典，辦事精明有條理，頗得利瑪竇欣賞。鑑於中國傳教區形勢的需要，利瑪竇任命高一志為南京會院的負責人。¹⁷

13 參見高一志於1592年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

14 周馴方編，《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獻叢編》，卷一：《破邪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頁121。（以下簡稱《破邪集》）。

15 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頁461；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書目及列傳》，頁88。

16 耶穌會發第四聖願是依納爵在建耶穌會之初，特別向教宗做的承諾，要會士絕對服從教宗的安排到世界各地去傳教。參見 ARSI, Lus., 3, 149; P. D'Elia, *Fonti Ricciane*, vol. II, la nota 4, tra le pagine, p. 278;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書目及列傳》，頁 86-87; A. Chiotti and L. Pfister, "I grandi missionari Alfonso Vagnone", in *Popoli* no. 7 (1984), p. 45.

17 M. Ricci, *Lettera Annuale del 15 agosto 1606*, ARSI, Jap-Sin; P. D'Elia, *Fonti Ricciane*, vol. II, pp. 277-278; P. T. Venturi, *Opere storiche*, p. 302.

1. 文化適應與學術傳教

耶穌會傳教策略是自上而下地向社會各階層進行傳教。要想讓一個國家皈依基督宗教，首先要先歸化那些在社會上有權力和有影響的人物，使他們對下層社會的皈依發揮巨大的影響力。¹⁸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激勵下，高一志努力實踐利瑪竇文化適應與學術傳教的策略。

至1609年，高一志在南京學習中文已很有成效，且能獨當一面負責南京教會事務。此時，徐光啟 (1562-1633) 因父親去世，在上海丁憂，期間曾多次拜訪了南京的神父們。由於徐光啟慕道和受洗都是在南京舉行，因而對南京教會有特殊的感情。在南京他沒有接受達官顯貴的宴請，也沒有住在官邸，而是選擇住在神父們簡樸的住宅，「因為與南京滿城官員的宴請相比，他 (徐光啟) 更喜歡和神父們親切地交流攀談」。¹⁹

在徐光啟鼓勵與協助下，高一志仿效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廣泛徵引《詩》、《書》、《易》、《禮》、《孔》及《孟》等儒家經典，用比附方法編寫了《推演正道論》與《諷諭偶編》。²⁰這兩部作品是高一志用中文寫作的重要營

18 孟德衛 (David E Mungello), 《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頁34。

19 1607年5月13日，徐光啟父親去世，享年七十歲，他照利瑪竇所吩咐的「嚴格按照天主教禮儀」為父親舉行了隆重的追悼禮儀，並按照中國的習俗返回鄉裡守孝三年，約於1607年冬至1610年聖誕節前夕，在上海丁憂。參閱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頁459、518。

20 鐘鳴旦，杜鼎克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冊一（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13），頁463-474。

試。後來，他於1615年出版了對利瑪竇教理的詮釋《教要解略》一書，該書對了解天主教教理極為重要。之後，高一志又寫了四篇神學論文，對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做了進一步註解。在同一年他又著了談論西方教育的《西學》，該書後被收錄到1632年在絳州出版的《童幼教育》一書中。²¹由此可知，1615年於高一志而言，是他前期學術活動中較為重要的時期。難怪耶穌會史學家巴托利對高一志如此評價：「初入中國之四年，一志精研中國語言文字，歐羅巴之人鮮有能及之者。因是撰作甚多，頗為中國文士所嘆賞」。²²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高一志在南京迅速開闢了一個傳教的新局面。在高神父大力推動下，「南京的基督徒比以往增加了一倍多，他們所表現的虔誠和熱心堪與北京的基督徒相媲美。如同龍華民神父 (Nicolò Longobardo, 1559-1654) 所說的，南京官員們也很欣賞我們天主教的信仰與耶穌會神父們」。²³

高龍鑾在《江南傳教史》用很大的篇幅論述高一志，他認為高神父在主持南京會院時，「是南京教務的全盛時期」。²⁴鄧恩更認為「經常造訪南京的徐光啟和李之藻 (1565-1630) 在激勵天主教團體的熱誠上，曾給了高一志無

21 這四篇論文：「第一篇是關於天主，第二篇是關於靈魂，第三篇是有關於原罪，第四篇是講述教主耶穌生平」。因為高一志於1615年著的《教要解略》是對天主教「天主經」「信經」等各種經文的詮釋。參閱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頁161。

22 D. Bartoli, *Del 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p. 1144; A. Chiotti and L. Pfister, *I grandi missionari Alfonso Vagnone*, p. 45; P. D'Elia, *Fonti Ricciane*, vol. II, pp. 277-278.

23 Cf. D. Bartoli, vol. IV, p. 25.

24 高龍鑾，《江南傳教史》，頁148。

可估量的幫助」。在晚明中國傳教區，「由高一志負責的南京傳教點工作似乎是最興旺的，皈依天主教的人數也是最多的。南京的工作受到了神父們的讚賞，天主教的信仰也得到了極高的評價」。²⁵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南京的教會具有如此的活力，在短期內獲得如此蓬勃的發展呢？從高一志寫給耶穌總會長阿奎委瓦 (Claudio Acquaviva, 1543-1615) 的年信中，我們獲悉，「一基督教友們熱心參加聖母會；再者，是由於徐光啟與李之藻基督徒生活的榜樣」。第三是因為「光啟在三年守制期間，屢至南京，以住院為下榻之處，使神父們取得官員保護」。²⁶

我認為高一志將南京教會發展迅速歸因為這三個理由是很有道理的。因為聖母會作為教會一個信仰小團體，具有較強的凝聚力，且互動性頻繁，易於刺激與激發教會團體的信仰成長。再者，身居高位的基督徒徐光啟與楊廷筠 (1562-1627) 生活的榜樣對其他教友的信仰無疑具有師範性作用，正所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而最後一點，初期中國教會在官方肯定與保護下，因此獲得了一個合法性的身份，官方的保護傘正好可以給傳教士在遭遇地方文化保守主義時提供免遭教難的保護。

因而高一志所提到的這三個原因可以視為其在南京傳教獲得成功的重要保障。這些有利的因素為高一志在南京的傳教活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25 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頁106；張凱，《龐迪我與中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30。

26 高龍鑾，《江南傳教史》，頁148-149。

至萬曆三十八年，在南京「為數眾多皈依者中，有三位與眾不同」，其中一位是姓許的「相當重要的官員」，²⁷另一位「是張多默，二人都是進士出身，西史稱之為博士」。²⁸

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給我們進一步論道：「有位擔任通政司的許姓高官，於萬曆三十八年年底在徐光啟的介紹下入教，教名若望，是當時改信天主教的顯貴中地位最高的人，為其領洗的神父是在南京傳教的王豐肅。」²⁹黃一農考證認為，該許姓官員乃許樂善 (1548-1627)，「字修之，號惺初，江蘇華亭人，隆慶五年進士，後升至南京通政使」。³⁰

原來當許樂善第一次讀利瑪竇的《天主實義》時，「感覺味如嚼蠟，這大概是因為書中蘊藏的真理與他所持的觀點不大一致。」³¹當高一志發現他對宗教沒有興趣，就不和他談論宗教，而是給他做了一個地球儀，並在上面加上了適當的注釋。在許樂善為西方科學的奇妙嘖嘖稱讚時，高一志不失時機開導他說：「與我們的聖教相比，數學簡直不值一提，聖教的理論比數學更為高深，更為必要」。³²

27 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頁106。

28 高龍擘，《江南傳教史》，頁149。

29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國立清華大學，2014），頁84。（以下簡稱《兩頭蛇》）

30 黃一農認為這個許姓官員，並非如德理賢 (Pasquale M. D'Elia, 1890-1963) 和裴化行 (Henri Bernard, 1889-1975) 所考證的「許晉臣」，因為許晉臣為浙江錢塘江人，曾經為艾儒略的《西學凡》和《職方外紀》做序。「惟他並未中舉也不曾出任，故不可能擔任專司納言的正三品通政使一職」。黃一農，《兩頭蛇》，頁84-85。

31 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頁461；參見黃一農，《兩頭蛇》，頁84。

32 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頁461。

無疑，高一志的這一番話如醍醐灌頂，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促使他仔細閱讀基督教的戒律，以新的思想和態度來重新閱讀利瑪竇神父的《天主實義》。對此，金尼閣敘述說：

作為長期以來他對神父們熱情、禮貌和信任的回報，神父們決定對他進行教化，他聽過佈道之後，憑著自己的理智與聰明得出結論：天主教值得被中國的大人物們所信仰。他被我們的佈道深深所打動，因為這正義與他善良的本性和溫文爾雅的氣質相吻合，他盡其所能地聆聽了王神父全部的佈道內容。³³

許樂善誠懇要求高一志讓他重新閱讀利神父的《天主實義》，高神父為幫他深入理解該書，給他專門寫了四篇論文：「第一篇是關於天主的，第二篇是關於靈魂的，第三篇是有關原罪的，第四篇是講述主耶穌基督生平的。天主於此給了莫大的安慰，使他受到了聖神的啟發，發現了天主教的真理」。³⁴之後，高一志滿足許樂善的渴望，送給他一副耶穌救世主的聖像，許樂善以極大的尊敬恭頌並設宴款待高神父。³⁵高一志為幫助許樂善深刻理解天主教教義中關於靈魂的知識，還特別寫了《性靈說》一文。³⁶在高一志的影響下，許樂善迅速而又認真讀完了《天主實義》，並以喜悅的心情領

33 同上。

34 同上。

35 同上。

36 鐘鳴旦、杜魯克等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冊二十六（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09），頁3-24。

受了洗禮，洗名若望。³⁷他是當時除了徐光啟，奉教官員中職位最高的一位。

從許樂善受洗的過程，不難看出正是由於徐光啟的強力推薦與高一志循循善誘，使得許氏最終皈依了天主教。高一志以科學吸引，再以教理歸化的傳教方法，在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堪稱為經典。

據《江南傳教史》記載，高一志還為一位姓秦的八十老翁付洗，這位德高望重的老翁是南京巨室之一，其先輩有功於朝廷，因而承襲了國公的爵位，在他病重的時候，由高一志領受教會病人付油禮後，安然去世。³⁸

1616年，南京禮部侍郎沈淮（1565-1624）在給萬曆皇帝的第一道奏疏中無意中披露了高一志對文人學士的影響，「臣初至南京，聞其聚有徒眾，營有寶廬，即欲修明本部職掌，擒治驅逐。而說者或謂其類實繁，其說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³⁹

一向關注從外教典籍中尋找研究天主教史料的名史學家陳垣（1880-1971），在引證明末高僧祿宏（1535-1615）的

37 鄧恩認為許姓官員（樂善）受洗在1612年。（參閱《從利瑪竇到湯若望》，頁106），應為有誤。根據高龍盤考證，1611年5月3日，高一志在南京奉獻聖堂典禮時，許樂善還曾贈送一幅對聯，懸掛在祭台兩側，在建教堂前許樂善亦曾捐款。由此可以斷定，許樂善受洗當在1611年之前。參見高龍盤，《在江南傳教史》，頁148。黃一農認為許樂善受洗確切時間應當在萬曆三十八年（1610），此說當為可信。參閱黃一農，《兩頭蛇》，頁84。

38 高龍盤，《江南傳教史》，頁149。

39 周綱方編，《南宮署續》，《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叢編》，冊二：《聖朝破邪集》，頁115。

文章時說，「現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時，眾所仰瞻以為向背者，予安得避逆耳之嫌，而不聽其忠告！」。陳垣對此感嘆道：「奉教者為賢士良友，正人君子，此反對者之言也」。⁴⁰方豪對此進一步肯定高一志的傳教業績：「一方面是『其類實繁』，證其數字之多；一方面有『士君子』『信向』，更證信教者素質之高」。⁴¹明史《沈淮傳》更將高一志與利瑪竇相提並論：「西洋人利瑪竇入貢，因居南京，與其徒王豐肅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⁴²上述資料除了證實高一志在南京的傳教成績，也呈現出他在培育新教友時，堅持「質」與「量」並重，在傳教方面無疑是成功的典範。

2. 興建首座歐式教堂

由於南京的傳教工作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高一志與中華耶穌會負責人龍華民（Nicolò Longobardo, 1559-1654）認為當時的環境已經安全，可以建立一座歐式教堂，吸引更多的人奉教。⁴³

在當時的南京要建教堂，首先需要得到政府官員審批，此外可能需要考慮民間宗教信仰對此的反應。對此，巴托利敘述道，「在談南京基督徒信仰生活之前，我要先談一下他們建立的教堂，他們不僅需要資金，而且還有一個事實，就是在中國首先需要得到政府官員許可，才可以在其他宗教廟

40 陳垣，《從外教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民元以來天主教史論集》（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85），頁21。

41 方豪，《中國天主教人物傳》，冊一，頁148。

42 同上書。

43 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頁95-97。

字或自十五世紀以來已經存在的家廟附近，建一座為敬拜天主的教堂」。⁴⁴ 這些困難在楊廷筠與許樂善等奉教人士協助下都迎刃而解。首先，李之藻慷慨捐款「買下了建築用地。其他朋友，包括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則慷慨解囊，捐贈了資金」。⁴⁵

蕭若瑟在《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對此有詳盡的描述：

王司鐸（高一志）傳教熱心，又長於演說。有許姓及張姓兩進士，亦聞道信主。而平民之被化奉教者更多。以至於利瑪竇昔年所設之經堂，已不能容。瞻禮日，教友登堂祈禱常有擁擠之患。王司鐸乃倡議改建洋式大教堂，商於教眾，莫不贊成。教眾慷慨解囊，不數日，湊成鉅款。所奇者，外教之人亦樂於捐輸，人心踴躍，指日興工，不數月，堂工告竣。頂上高懸白玉十字架，闔城望見。中國前此未有也。⁴⁶

教堂竣工後，許樂善親自書寫「贈送楹聯，懸於祭台兩旁」。⁴⁷ 他們在教堂正面牆壁上鐫刻了三十個榜書大字：「一六一一年五月三日，耶穌會諸神甫在中華古國之南京，建築之第一教堂。」⁴⁸ 1611年5月3日，在李之藻、許樂善奉教士大夫的幫助下，高一志舉行了隆重的「聖十字架教堂」奉獻大

典，⁴⁹ 並在當天舉行了隆重的奉獻教堂彌撒，與此同時，「教友們也將舊教堂的東西全都搬到了新教堂」。⁵⁰

有關該教堂的材料即建築的風格，巴托利也有相關描述：「教堂竣工了，教堂的建築材料是取自本地。選用上好的磚石及製作精良的木雕；建築及壁畫是歐式風格的，……這些都是中國人前所未見的，他們對我們的教堂讚不絕口，感嘆中國的建築不如歐洲」。⁵¹

教堂主體建築結束後，高一志又相繼建了「七間無樑殿樓房，花園……首楹園廳房」及「房地一塊，坐落於崇禮街西營三鋪地方，前街至後巷基地通共七間」。⁵² 高神父根據歐洲的習慣，將教堂和神父們住宅連為一體，形成了完整的建築群，既有神父們的住宅，也有培訓教友的基地，充份體現出他對南京教會傳教活動有長遠的發展規劃。

3. 培訓傳道員傳教

1611年，南京的教堂建好後，高一志在傳教策略方面做了調整，就是將上層與下層傳教路線結合起來，在向知識份子傳福音的同時，加大力度推進向社會底層人士傳教的步伐。由於傳教士人數少，需要傳道員協助講道，必要時要舉行洗禮。

⁴⁴ Cfr. D. Bartoli, vol. XVII, pp. 24-26.

⁴⁵ 同上。

⁴⁶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書目及列傳》，頁89。

⁴⁷ 黃一農，《兩頭蛇》，頁84。

⁴⁸ D. Bartoli, vol. XVII, pp. 24-26; 參見《明史》，卷326。《列傳214·意大利亞傳》；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頁121；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頁154。

⁴⁹ 參閱D. Bartoli, vol. XVII, pp. 24-26；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頁121；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頁154。

⁵⁰ 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頁108。

⁵¹ Cfr. D. Bartoli, vol. IV, p. 27.

⁵² 周駢方編，《破邪集》，卷二，頁139。

但在初期中國教會，來華傳教士是嚴格按照教會禮規用拉丁語施行洗禮，並未把洗禮經文譯為中文，讓新教友去施行洗禮，因為害怕由於兩種語言的差異，讀錯了拉丁洗禮經文，致使聖事無效⁵³。其實，特倫多大公會（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早有明確規定關於如何施行有效的洗禮：「若正確按照教會的意向施行，洗禮經常有效，因為洗禮不僅是信仰的記號，它還是因著天主教在聖事中行事的能力經常有效，即事效性。」⁵⁴

除了施行洗禮之外，另外一個困擾傳教士們的問題是，在當時中國教會還沒有成熟的天主三位一體中文術語的翻譯。為推動傳道員大力宣教，1611年4月，龍華民在南京與高一志等會士一起討論舉行洗禮的禮儀。之後，高一志用拉丁文音譯的形式，將施洗經文翻譯為中文：「我洗爾，因拔的利揭，非略揭，西必利多三多明者，亞們」。⁵⁵ 很明顯，高一志即以此來培訓教友學習給病人施行洗禮，凡遇有垂死的嬰孩，即為之付洗。⁵⁶

徐昌治的《破邪集》對高一志領導下的南京教會團體，在為慕道者施行洗禮時有詳細的描述：「從其教者，灑之以水，曰「灑聖水」，擦以油，曰「擦聖油」，……

53 參閱高龍鞏，《江南傳教史》，冊一，頁140。

54 谷寒松等編，《神學辭典》（台北：光啟出版社，2012），頁1109。

55 「我洗爾，因拔的利揭，非略揭，西必利多三多明者，亞們」。參見周駟方編，《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叢編》，冊二，頁133。拉丁語原文：*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音譯為：*Patris/ 拔的利揭，Filii/ 非略揭，Spiritus Sancti/ 西必利多三多明者*；今譯為：「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你授洗」。參見第1284條，《天主教教理》（台灣：天主教教務協進出版社，1996），頁311；谷寒松等編輯，《神學辭典》，頁1106-1111。

56 高龍鞏，《江南傳教史》，第一冊，頁148。

其每月房、虛、星、昴、大小瞻禮等日，俱三更聚集天明散去……」。⁵⁷ 且「其眾俱同，七日一會，歲時不絕」。⁵⁸ 這是談到南京教友每星期日與教會節日都要聚會，並舉行洗禮。由於教友日漸增多，為了避免進教堂擁擠，高一志將南京分為三個區，每個區的教友按照規定時間進教堂參與彌撒，並為每個區指定負責人。⁵⁹

高一志教信耶穌會總會長阿奎瓦時談到，「那時在中國，南京教會一如其他會院，傳教事業一帆風順，教友數字增長很快，僅僅四個月時間，就發展了六十個教友」。⁶⁰

通過《破邪集》我們獲得非常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在對高一志與曾德昭的審訊記錄中可以得知，1609年至1616年南京基督徒皈依的情況，除士大夫、官員接受洗禮外，還有一些社會底層民眾，因高一志與鐘鳴禮及鐘鳴仁而奉教。

1616年，在南京教難被捕的一名叫夏玉的糕點商人的證詞中，可以看出高一志傳教方法的改變。1612年10月，夏玉去了以編織草帽為生的曹秀家中，身為基督徒的曹秀，跟他談話時說：「天主生天、生地、生萬物。汝何不從之？」緊接著，當時在場的鐘鳴禮也給夏玉仔細講解了這一教理。夏玉質問說：「既謂之天主，何以有像？」鐘鳴仁答說：「當初天主化生，止有一男一女，自後百姓作業，不認得天主了，所

57 周駟方編，《破邪集》，卷二，頁131。

58 高龍鞏，《江南傳教史》，第一冊，頁148。

59 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頁106。

60 ARSI, Jap-Sin, 161 I, ff.1-26 (A. Vagnone, al Padre Generale sulla Persecuzione di Nanchino, 4-1-1619).

以洪水氾濫，遭此大難。天主不忍，降生西洋國，以教化天下，至今共一千六百十五、六年。又將夷教書十五本，付玉誦讀，隨進天主堂，擦油淋水」。⁶¹

從曹秀、鐘鳴仁與夏玉之間的對話，可以看出高一志培訓傳教員的模式，是先派傳教員出去傳教，發現有慕道者將其帶進教堂，由高一志進一步講道、考核，然後，為慕道者施行洗禮。

此外，高一志建立了聖母會，旨在幫助婦女「實行默誦與永遠守貞之贖罪方法者」。⁶²也許是基於儒家禮教「男女授受不親」，或者由於歐洲神學倫理教育，高一志從不向婦女直接傳教或施行洗禮，「若婦人有從教者，就差鐘鳴仁前往女家，以聖水淋之，止不用油。」⁶³儘管如此，後來在教難爆發後還是被詬病，成為罪狀之一。⁶⁴

據《破邪集》載，1610年正月，高一志去拜訪一位年六十一歲，來自江西撫州府的書商周用，請他印刷天主經與教理書，在與周用聊天時，他不失時機地開導說：「你年紀老大，何不從天主教，日後魂靈可升天堂！」高一志直白的話語，似乎有神奇的力量，於是「用遂入教」。⁶⁵高一志善於跟不同階層的人士對話和交流，且能把握時機，引入認識天

61 周駟方編，同上書，頁131；另參考，謝和蔚著，歐昇譯，《中國與基督教》（上海：小箱出版社，2003），頁80-81。

62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頁89。

63 參閱周駟方編，《破邪集》，卷二，頁131。

64 見沈淮，《發還違夷回奏疏》：「該臣看得王豐肅等，潛住多年，妄稱天主，利驅術誘，愚民被其煽惑，不難出妻獻子。至於擦油灑水，婦女皆然，而風俗之壞極矣。」見《聖朝破邪集》，頁97。

65 參閱周駟方編，同上書，頁131-132。

主。他在皈依社會底層人士方面所採取的靈活機制的的方法往往奏效。

從下列於南京教難被捕基督徒的名單可以看出，高一志為平民傳教所取得的不凡的業績。

1616年南京教案被捕基督徒表⁶⁶

姓名	年歲	籍貫	職業	入教時間	入教緣由
鐘鳴仁	55	廣東新會	修士	幼時受洗	因其父鐘念山入教
鐘鳴禮	34	廣東新會	修士	幼時受洗	因其父鐘念山入教
蔡思命	22	廣東新會	書僮		投王豐肅家
方政	32	徽州府歙縣	描金	萬曆三十八年	因其叔方文榜勸入教
湯洪	32	上元縣	未詳	萬曆四十年	因故兄湯應科勸入教
夏玉	33	南京軍右衛	賣糕	萬曆四十年	因曹秀勸
張家	26	山西曲沃縣	推水	萬曆四十三年	因同鄉稱說
王玉明	29	福建邵武	煮飯		在天主堂煮飯

66 同上，頁129-136；陳垣，《民元以來天主教史論集》，頁22-24。

姓名	年歲	籍貫	職業	入教時間	入教緣由
姚如望	61	福建 星華府 莆田縣	挑腳	萬曆 四十二年	
王甫	31	浙江 烏程	看園	萬曆 四十四年	因余成元勸
余成元	29	江西	種園	萬曆 三十九年	因表叔 曹秀勸
遊祿	53	江西南 昌	篦頭	萬曆 四十四年	因羅儒望勸
張元	32	江西 瑞州	結帽	萬曆 四十年	因仰慕 王豐肅
王文	30	江西 湖口縣	補網	萬曆 四十四年	因姐夫 曹秀勸
劉二	39	江西 都康	木匠	萬曆 四十二年	因王豐肅勸
周可斗	27	江西 湖口	結帽	萬曆 四十四年	
曹秀	40	江西南 昌	結帽	萬曆 四十年	因妻疾祈禱
幼童 三郎	15	上海	在王豐肅 處讀書	萬曆 四十三年	
仁兒	14	北直 保定府	在王豐肅 處讀書	萬曆 四十四年	
龍兒	14	北直 保定府	在王豐肅 處讀書	萬曆 四十四年	

《南宮牘署》訴訟記錄給我們披露的被捕基督徒一表顯示，高一志不僅向士大夫階級宣教，也特別關注歸化平民階層，以直接的方法向他們傳教。⁶⁷在這些平民階層的基督徒中，除鐘鳴仁與鐘鳴禮兄弟自幼從其父受洗之外，其餘都是在高一志擔任南京會院負責人期間受洗。從身份來看，「除了修士、刷印、孤兒三人，結帽三人，此外擔水、描金、挑腳、剃頭、畫童、補網、煮飯、賣糕、種園、看園、木匠各業皆有」。⁶⁸

從原籍來看以江西人為主，他們共有七人，佔總人數三份之一。從時間上看，主要從萬曆三十八年（1610）到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難開始，正好是高一志主持南京教會期間。從這些皈依者中，我們看到明末社會底層眾生相的一個縮影。這些新教友之所以皈依天主教，大多是因為「因王豐肅所勸」，「仰慕王豐肅」及「投奔王豐肅」，或者是因為親戚相勸勉。直到1616年，「時入教者甚眾，中有士大夫數人」。⁶⁹

作為高一志上司的龍華民，雖然在譯名之爭中對高一志這個老對頭很不滿意，⁷⁰但對高一志在南京的傳教業績做出了極為中肯的評價，他認為「南京傳教所乃當時中國全國最發達的傳教所之一，是為各種德行燦爛之園圃。入教及受洗

67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書目及列傳〉，頁90-91；陳垣，〈民元以來天主教史論集〉，頁21-22。

68 參閱謝和耐著，耿昇譯，〈中國與基督教〉，頁80-81。

69 參見周駟方編，〈聖朝破邪集〉，卷二，〈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叢編〉，冊二，頁117；方豪，〈中國天主教人物傳〉，冊一，頁149。

70 參閱拙作：段春生，〈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1566-1640）為 Deus 漢譯「上帝」與「天」的辯護〉，〈哲學與文化〉，2017年待出。

者甚眾，其中有士大夫，城鄉居民也不少，亦有外國人。一志為婦女設天使聖母會一所，其實行默誦與永遠守貞之方法者，為數甚多」。⁷¹

此外，其他相當多的資料也披露了高一志在南京傳教的盛況：「教友們在仁愛、熱誠和熱心的工作中，互相比賽，看誰對窮人、鰥寡之人和孤兒幫助的得多，使之重建了早期教會的精神。教友們對貧苦的病人施行仁愛，將他們帶到家中照料他們，這使教外人無不感到驚異」。⁷²

如果說上述史料多來自教會內部，《明史》《列傳214·意大利亞傳》對此也有記載：「王豐肅（高一志）、陽瑪諾等，煽惑群眾，不下萬人，朔望朝拜，動以千計。」⁷³這個官方文件，揭示了高一志在南京掀起的一場盛大傳教活動，不過，其人數之多是否如明史所言「動以千計」或「不下萬人」，我認為這可能是一種誇張的說法。

根據鐘鳴旦以及趙慶源神父編著的《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的研究，十七世紀初期中國天主教人數統計為：1606年1,000人，1610年2,500人，1615年，南京教案前全國教友人數為5,000人。⁷⁴南京及其附近的教友約有1,000多人，其人數很有可能位居全國首位。⁷⁵

71 參閱 D. Bartoli, vol. XVII, pp. 74-76；賈賴之，《明清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89。

72 D. Bartoli, vol. IV, p. 25；高龍鞏，《江南傳教史》，冊一，頁148；張凱，《龐迪我與中國》，頁328。

73 見《明史》卷326·《列傳214·意大利亞傳》。

74 Nicolas Standaert, "Chinese Christians" in *Handbook*, pp. 380-393, esp. 382；趙慶源編，《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台南：間道出版社，1976），頁13。

75 張凱，《龐迪我與中國》，頁328。

三、暴風雨中基督徒的信仰見證

1616年至1618年期間，發生在南京的教難，雖然無法與同期發生在日本長崎的教難相比⁷⁶，但是也湧現出許多傑出的基督徒，為信仰做出了英勇的見證。這些信仰的見證，反映了高一志長期以來在這些基督徒的生命中所播下的聖言的種子，已經茁壯成長並產生了信仰的果實。

作為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楊廷筠為捍衛教會的信仰，寫了許多信給幾個官員，為傳教士辯護，駁斥沈淮對傳教士及天主教的控告。⁷⁷面對沈淮的發難，著名基督徒徐光啟也格外關心高一志及南京的發展動態。他在《家書》（十一）諄諄告誡上海的家人說：「西洋先生（龐迪我、高一志等）被南北禮部參論，不知何由。南京諸處移文驅迫，一似不肯相容，杭州諒不妨。如南京先生（高一志與曾德昭二神父），有到上海者，可收拾西堂與住屋也」。⁷⁸這封家書充份表達了徐光啟對作為一個天主教徒對傳教士深深的擔憂與關切。

此後，徐光啟寫了一部對中國天主教影響深遠的護教性著作《辨學章疏》：

臣見邸報，南京禮部參西洋陪臣龐迪我等，內言其說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一雲妄為星官之

76 http://www.catholic.org.tw/dominicanfamily/saints_japan.htm (2016年11月11日)。

77 曾德昭，《大中國志》，頁252。

78 見徐光啟，《家書》，十一，《徐光啟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492；梁家勉，《徐光啟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113；陳衛平、李春勇，《徐光啟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156。

言，士人亦墮其雲霧。曰士君子，曰士人，部臣恐根株連及，略不指名。然廷臣之中，……信向之者臣也，與言星官者臣也，諸陪臣果應得罪，臣豈敢幸部臣之不言以苟免乎！⁷⁹

徐光啟在這部著名的辯護書中，以「信向之者臣也，與言星官者臣也」之言，勇敢坦承自己是天主教徒，證明這些傳教士均為博學有德之人。他們所傳之道，不但高出佛道二教，且與儒教道德相符合，希望朝廷能像對佛教與伊斯蘭教那樣容納天主教。萬曆帝看到徐光啟奏章御批「知道了」三字，有意將此事擱置起來。但沈淮不肯罷休，又上第二疏，指控高一志有政治野心，將顛覆大明王朝的根基。萬曆帝在沈淮危言聳聽的一再控告下，終於頒布了驅逐教士離境的諭令。⁸⁰

1616年8月4日，三位兵士在南京會院拘捕了高一志與曾德昭。高一志被帶上一乘轎子押往監獄。一路上圍觀的看客對高一志極盡譏笑和嘲諷之能事，但他卻「將這些笑聲歸於天主賜給他特殊的恩典，（因為）他做好了隨時為信仰殉道的準備」。⁸¹ 高一志被關入牢房，和他在囚牢裏的兩名中國教友，「他們跟隨高一志三年之久，信仰堅定願與他們的神父共命運」。高神父被捕的消息傳來，教友們紛紛趕來神父們

的住地，為首的名叫姚若望，他手揮小黃旗，大聲吶喊「願為基督而死，為耶穌基督的信仰甘灑我的熱血。」⁸² 他被帶到法庭，判官不知所措，只好釋他放回家。1616年9月1日，沈淮命令將患病的曾德昭與其他教友一併逮捕入獄。接著，他命令徹查神父們的花園，結果在那裡沒有找到他所希望見到的武器。於是，他控告神父們購買武器聚眾謀反的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⁸³

在南京禮部，有一位親近神父們的官員，他願意支持和保護神父們。他質問沈淮「為什麼要逮捕南京的神父和教友們？」。沈淮答道：「因為他們宣傳和教導一種反對和危害我們國家的信仰」。這個朋友接著問：「相對於天主教而言，有很多宗教向人民宣傳和教導許多反對我們的理論，你為什麼不去逮捕他們呢？」沈淮說：「沒有任何人請求去逮捕審判他們」。這位朋友接著說：「是誰起訴這些傳教士，讓你們逮捕審判他們呢？」沈淮被質問的無言以對，臉色通紅。⁸⁴ 參與審理此案的官員啟都很同情傳教士們的遭遇，大家認為對神父們的訴訟是「不必要的小題大做」。儘管他們想就此罷手，但沈淮依然堅持不放鬆。⁸⁵

1617年2月18日，萬曆皇帝正式下達了傳教士返回自己國家的驅逐令。⁸⁶ 在此特殊時刻，高一志「敦促天主教徒們做好為信仰而蒙難的準備」。這場暴風持續了十六個月，共有二

79 徐光啟，《家書》，十一，頁492；參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83-85。

80 方豪，《中國天主教人物傳》，冊一（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67），頁105；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頁164-165；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頁83-85。

81 參閱ARSI, Jap-Sin 161 I.1-26；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頁118-120。

82 參閱ARSI, Jap-Sin 161 I.1-26。

83 同上。

84 同上。

85 同上。

86 同上。

十六人被捕下獄，教難之後，被捕的教友們每人挨了七十大板，然後被釋放，其中有一位名叫安德者被鞭刑拷打致死。他可能是明末以來第一位殉道者。⁸⁷

1617年4月30日，高一志與曾德昭從牢房中被提出來，囚禁於關押死囚的木籠車，禁止任何人與他們講話或者與他有任何接觸。他們在木車上被關了四天才被放出來，南京的教友們一直陪伴著他們。後來有些學者和朝中「有職位的官員」來看望這二位傳教士，且以詩文相贈，「以示他們的情感，並且留下一些紀念品。來訪的朋友們對耶穌會士的不幸遭遇均充滿了同情」。⁸⁸

1617年5月20日，經過一個月的長途跋涉，高一志一行順利抵達廣州，後被關在黑暗的牢房達七個月之久。1618年初，高一志一行被轉交給澳門。1618年初，高一志一行到了澳門後，即住在澳門聖保祿公學院，直至1624年，他始得重新潛入內地傳教。⁸⁹

四、結論

高一志在南京主持教務期間，積極實踐利瑪竇文化適應與學術傳教的策略，認真學習中國語言和儒家經典，以出色的語言天份與寫作才能，借助「西學」吸引官員與文學士接觸「西教」，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除了在上層社會進行學術傳教外，高神父也致力向平民傳福音。他借鑒歐洲教會的傳教模式，建立了善會團體，以推進南京的傳教工作。他為培育婦女信仰生活建立了聖母會，該會在南京的發展堪與北京由利瑪竇建的聖母會相媲美。

為解決傳教人員緊缺，他培訓平信徒傳道員深入到社會各階層協助其傳教。培育平信徒傳教，是高一志在長期牧靈生活中逐步摸索出來的一套新的傳教方法，在高一志領導下，南京的平信徒傳道員在傳教活動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即便，在1616年教難爆發，高一志被捕入獄後，許多教友依然堅持信仰熱忱，情願為基督而獻身，於此可見，當時南京基督徒已擁有了成熟的信仰。

除了論述高一志在傳教方面的所取得成就外，我們也需要提及由於他個性的暴躁和缺乏足夠的忍耐，致使傳教區因南京教難受到很大的影響。關於這一點，有學者認為，他對佛教僧人態度不夠友善，甚至激怒了他們，這些僧人聯合南京的文化保守主義與仇教勢力共同敵對傳教士，終於釀成震驚中外的南京教難。有學者認為南京教難實際上是方從哲、沈淮等保守勢力與進步的東林黨之間政治鬥爭的結果，傳教士只不過成為這場鬥爭的犧牲品；也有學者認為當時的教難並未導致大批的神職人員與基督徒殉道，與同期發生在日本長崎的幕府時期的教難相比，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個教案而已。⁹⁰

⁸⁷ 費神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66。

⁸⁸ 耶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頁229。

⁸⁹ 同上，頁230。

⁹⁰ 同上，頁205-206。

無論如何，南京教難（南京教案）在高一志的傳教生涯中都是一個永遠無法迴避的問題，促使他進行反思和改進自己的傳教方法。事實上，他於1618及1619年在澳門致信耶穌會總會長時，既謙虛地坦承了自己在南京傳教時所有的大膽冒進的缺點。1624年底，當他進入山西傳教時，即一改在南京時所採取的張揚、喧嘩與激進的傳教態度，進而以謙虛、溫和、謹慎、小心，努力與當地官員建立良好關係，作為其晚年在山西傳教的方針策略。高一志在其生命中最後的十五年裡，於山西傳教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從他到山西絳州時不到五十個教友，到他去世時留給山西教會八千多教友，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

高一志的傳教經驗對後來的傳教士，尤其對當下中國教會的福傳具有很重要的啟迪作用。雖然，今天的中國教會與三百多年前的教會所面對的問題不一樣，但歷史與現實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歷史像一面鏡子不斷折射著今天的現實，並給生活在當下的人們以啟迪與思考，使人們從撲朔迷離、紛繁複雜的歷史時空的交錯中學到避免重蹈覆轍的經驗和教訓。正如著名史學家岡薩雷斯（Justo L. González）所說：「歷史是一位偉大的老師，他可以指導我們的現在，並引領我們的未來。正是從歷史的經驗中，我們積累了應對現在的智慧。歷史告訴了我們應當避免哪些危險，歷史向我們指明了通往未來的道路」。⁹¹

通過對歷史的研究，我們會發現，高一志在南京的方法可以歸納為：一、學術傳教，即通過著述立說介紹教會教義，與不同文化族群進行對話交流；二、培訓平信徒，深入到社會各階層去福傳，廣泛開展傳教新局面；三、建立不同善會信仰小團體，加強信仰互動，推動信徒的信仰成長；四、處理教會與政府及文化的關係，營造較為寬鬆和諧利於福音傳播的環境等。相信，高一志的傳教經驗與方法，對於今天教會的發展仍具有一定的反思和借鑒作用。

91 岡薩雷斯，《基督教史》（上海：三聯書店，2016），頁XVI。